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2007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主 编 陶德麟

副 主 编 汪信砚 何 萍

编 委 会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朱传棨 李佃来 陈祖华

陈立新 汪信砚 何 萍

姜锡润 陶德麟 赵凯荣

赵士发 萧诗美 雍 涛

本辑执行主编 萧诗美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7)/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 - 7 - 216 - 05689 - 2

- I. 马…
- II. 武…
-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 IV. 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985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7)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主办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420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689 - 2 定价:3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参加 1978 年真理标准讨论会的前前后后	陶德麟(3)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汪信砚(14)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 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若干问题.....	陈金龙(26)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雍 涛(38)
文化领域矛盾处理方法的重要探索和失误 ——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五十周年	胡振平(54)
围绕毛泽东思想在党章的确立与取消 引发的关于思想解放的进一步 思考——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年纪念	赵凯荣(60)
回顾、反思与前瞻：文化整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刘友红(75)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之浅论——读《神圣家族》 笔记之一	朱传棨 陈治桃(87)
论马克思的科学观革命	萧诗美(104)
异化劳动理论的存在论取向	陈立新(126)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定义与人的本质的多维性	左亚文(136)
两种人的本质论之比较 —— 兼论关系范畴的哲学史意义	李 志(144)
“感性活动”的超越性	罗红梅(153)
论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 ——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解读	李映楠(161)
异化的扬弃与共产主义 —— 读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周 可(169)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合法性思考——以列宁“反映论”

- 与海德格尔“去蔽说”为个案阐释 孙亮(181)
历史主义传统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 赵士发 胡红生(190)
论马克思的劳动观的发展对唯物史观的影响 曹亚雄(202)
马克思主义的解题观及其哲学意义 张掌然 陈幼堂(214)
真理与价值统一关系论纲 肖新发(223)
关于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探讨 陈熙(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思想评析 姜锡润 马健(239)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王雨辰 张翠(248)
不可能性：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命运 李佃来(259)
论葛兰西的语言研究 吴昕炜(271)



文化问题研究

- 中国女性主义问题 何萍(283)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平均主义思潮研究 袁银传(292)
马克思交往理论视野内的奥林匹克运动 苏锦荣(303)



哲学新书评介

- 实践进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历史根基——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 刘国胜(315)
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评《面向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拥军(323)



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

- 2007年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大事记 (335)

Contents^①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Attending the Discussion on Truth Criterion in 1978	Tao Delin(3)
Developing Chinese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Based on China's Special Actuality	Wang Xinyan(14)
Seeing Several Problem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1950s	Chen Jinlong(26)
On Practice, On Contradiction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Yong Tao(38)
Significant Exploration and Errors of Contradiction Handling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 In memory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On Correctly Handling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Hu Zhenping(54)
Further Thinking on Thought Liberation Caused by the Establish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in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In memory of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ussion on Truth Criterion	Zhao Kairong(60)
Review,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Marxism in China	Liu Youhong(75)

Research on Classic Works of Marxist Philosophy

Discussion on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Founded by Marx and Engels Together	Zhu Chuanqi Chen Zhitao(87)
On the Revolu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Science	Xiao Shimei(104)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Chen Lixin(126)

① 戴劲译,萧诗美校。

Marx's Definition of Human Essence an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Human Essence	Zuo Yawen(136)
Comparison between Two Theories of Human Essence	Li Zhi(144)
Transcendence of "sensible Activity".....	Luo Hongmei(153)
On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Human Development— Explanation centering on German Ideology	Li Yingnan(161)
The Sublation of Alienation and Communism — Reading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by Marx	Zhou Ke(169)

Research on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Legal Think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Marxist Philosophy — Explana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cases of Lenin's Theory of Reflection and Heidegger's Theory of Aletheia	Sun Liang(181)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Marx's Historical Principles	Zhao Shifa Hu Hongsheng(190)
On th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on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ao Yaxiong(202)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on Problem— solving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Zhang Zhang - ran Chen You - tang(214)
Discussion on the Uni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and Value	Xiao Xinfia(223)
Probe into the Ontological Problems of Value	Chen Xi(231)

Western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y

Analysis on Western Social Criticism Thought on Marxism	Jiang Xirun Ma Jian(239)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y Frankfurt School	Wang Yuchen Zhang Cui(248)
Impossibility: Fortune of Habermas's Theory on Civil Society	Li Dianlai(259)
On Gramsci's Language Research	Wu Xinwei(271)

Research on Cultural Proble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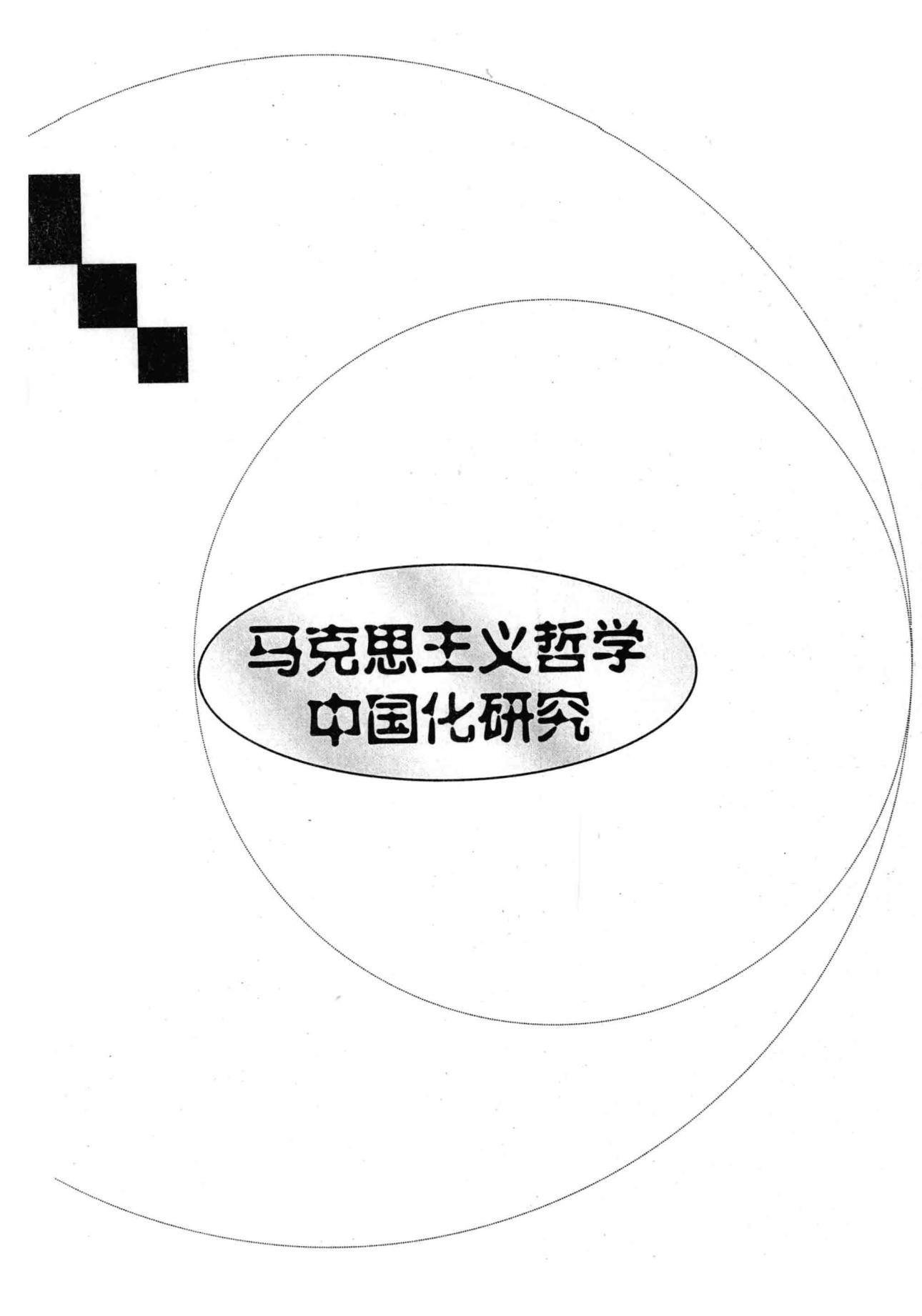
Problems of Chinese Feminism	He Ping(283)
Research on Equalitarianism Thoughts in Marxist Field	Yuan Yinchuan(292)
Olympic Movement in the Field of Marx's Theory on Exchange	Su Jinrong(303)

Recommendation of New Books on Philosophy

Practice Access: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 Reading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History and Review	Liu Guosheng(315)
A New Concept of Marxist Philosophy — Review o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New Century	Ma Yongjun(323)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Exchange

Memorabilia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Institute of Wuhan University 2007	(335)
---	-------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研究

参加 1978 年真理标准 讨论会的前前后后

|| 陶德麟 ||

今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三十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引起的变化对我们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这一变化的发端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历史是不能淡忘的。许多当事人已经发表了不少回忆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这场讨论。我只是参与这场讨论的普通一兵，同理论界的一批同志一起尽了一点微薄之力。十年前我在一个会议上介绍过一些亲身经历的情况^①，但没有见诸文字。今年有两家报纸要来就这次讨论的情况采访我，这才又一次引发了我的回忆。除了回答采访的问题外^②，我想借此机会提供一些并非众所周知的情况，算是对其他的文章的补充吧。

灾难 · 沉思 · 觉醒

我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历史的安排，这与我的经历有关。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青年讲师，是李达同志的科研助手。1961年毛主席委托李达同志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我被指定为主要执笔人，与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在李达同志指导下兢兢业业地工作，总想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好毛主席委托的任务。可是，正当上卷送审稿完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由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毕生奋斗的李达同志竟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就含冤去世了。他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他重新创办的武大哲学系有 12 位教师

^① 指 1998 年 5 月 14 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全国高校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② 见《楚天都市报》2008 年 1 月 9 日 T2—T3 版《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之一——凝思》载《穿越丛林的响箭》一文。

被打成“黑帮分子”。我作为他的助手，当然在劫难逃，年仅 35 岁就被打成了重要的“黑帮分子”，运动一开始就被日夜批斗，勒令交待“罪行”，与武大的一百八十多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一起被押送到武汉附近的东升公社去监督劳动改造。1967 年初，武大的部分师生对李达“三家村”案提出了质疑，发动了翻案活动，我和哲学系的余志宏、李其驹、萧莲父、康宏達几位干部和教师也参加了为李达同志翻案的活动，随后就背上为“反革命”翻案的罪名被打成了所谓“5·16 分子”，受到更残酷的打击，全家老小都受到牵连，惨苦不堪。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八年，坐过单身牢房，干过各式各样摧残性的体力劳动，有几次险些丧命。直到 1974 年李达同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干预下平反后，我才因病调回学校，被安排在政治理论教研室给工人理论班讲课。但我在当时学校军工宣队领导人心目中仍然是有严重问题的人，讲课不过是另一种监督改造的形式，课讲得再好也是不能表扬的。这种处境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也没有根本改善。

在十年“文革”的惨苦环境中我在想什么呢？起初我是被打懵了，只觉得昏天黑地，看不到光明。我不服，但想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李达同志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战斗了几十年，他是“坏人”么？成千成万的老革命，成千成万对祖国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各界人士，成千成万的善良的老百姓，都是“坏人”么？我自己是“坏人”么？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在人们高唱“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却是人民的苦难和祖国的沉沦。我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上的痛苦。我被迫一边劳动改造，一边学习当时权威理论家们宣传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却让我越学越无法理解。一方面讲“实事求是”，一方面又大搞假材料，制造大批的冤案；一方面批英雄史观，一方面又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循环往复，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一方面又说领袖能“洞察一切”，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顶峰”；一方面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方面又猛批“唯生产力论”，鼓吹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连健全常识都无法接受的谬论能叫做马克思主义么？我怀疑了，愤怒了，感到受了极大的欺骗，人们也正在受着欺骗。这样下去，不仅我个人“永世不得翻身”，整个中国的前途也将不堪设想。我当时虽然不敢吭声，但心里却逐渐明白了：也许中国正在歧路上彷徨。我从迷惘和绝望中苏醒过来，朦胧地看到了希望，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中国的局面总有一天会改变。我在 1974 年偷偷写下的首小诗可以代表当时的心情：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6 年 10 月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一片欢腾，我自然也兴奋了一阵，但很快就被打进闷葫芦里了。一则我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学校领导还是“文革”

中的原班人马，他们还是把我当作异类。二则过了不到四个月（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就发表了社论，宣布了著名的“两个凡是”，等于说“文革”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歪曲了“文革”。“文革”的运动是“结束”了，“文革”的理论基础、路线方针还是不能触动，还要继续贯彻，乃至“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也不能平反。可是，按“文革”的老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希望实现周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吗？中国还有光明的前途吗？我的心情郁闷依然，不能不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1977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发来了请柬，要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四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我整整 11 年没有跟外界发生联系，以我的处境，收到这样的请柬自然非常惊喜。可是当时武大还是军工宣队领导，他们不同意我去。经过抗争，他们因为毕竟拿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只好勉强同意，但特地派一位“可靠”的教师跟我“一道”去，这“意义”不说自明。

9 月 20 日我到了阔别多年的首都，下午 2 时到《红旗》杂志隔壁的会场参加大会。我迟到了一天，会议已经开始。可是到会的师友们看到我来了都极其热烈地鼓掌欢迎，有的同志噙着热泪紧握我的手说：“你受苦了！”“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那种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哲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到会了，还有部队的同志、大庆油田的同志，新华社，各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部的同志共三百多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同志在发言中特别讲到，他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对他说过，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毛主席读了十遍，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李达同志的《经济学大纲》毛主席也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十遍。奉命“陪同”我去的那位教师后来也主动地对我说，他见到那种场面也非常感动，受到很大的教育。

会议期间，我与邢贲思、赵凤歧、陈筠泉等同志交流了思想，看法完全一致。那时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①，我们还不知道他在两个月前就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②，但我们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是有认识的。我们谈到，给全民族造成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怎么竟然会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形成骇人听闻的狂热，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中央主要领导人现在还不觉悟？“文革”的畸形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我们认为，造成“文革”的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不止一端，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文革”的一套“理论”所起的误导作用。这套理论以超等“革命”的面貌把广大群众特别是毫无经验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完全搞乱

① 1977 年 7 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② 1977 年 5 月 24 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批评了华国锋坚持的“两个凡是”，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 页。

了，成了把人们引入迷途的符咒。不从根本上驳倒这套“理论”，就谈不上纠正“文革”的错误，防止“文革”的重演或变相重演。而这套错误“理论”的根子正在哲学，正如民主革命时期“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根子在哲学一样。要驳倒“文革”的错误理论，就必须从哲学入手。我们当时认为，影响最大的错误哲学观点有两个：一个观点是“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在真理问题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可言。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判断是不是真理，不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而看它是出自“无产阶级”之口还是出自“资产阶级”之口；而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是由“中央文革”钦定的。这就根本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科学概念，可以由掌权者任意妄断了。另一个观点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就根本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的科学论断，实际上没有标准了。只要认可了这两个哲学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所以，我们痛切地感到，只有下功夫驳倒这两个荒谬的哲学观点，摧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我也就是在那时打下了思想基础，下决心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再一次受到打击也在所不惜。但是，“两个凡是”是当时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坚持的，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政治栅栏。谁想跨越这个栅栏，很可能又是“反革命”了。在那种气候下，要找到突破这一禁区的方法，真是谈何容易！

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会：登上破冰之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由来和背景，但我意识到这是在向“两个凡是”开炮了。我接触的教师在私下谈话中有的偷偷地表示赞成和高兴，有的表示反对，多数人则非常谨慎，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有消息灵通人士还说中央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毒草”。后来北京的朋友们也传来各种各样的信息，说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热烈赞同的，也有愤怒指责的，指责的人当中有人说一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作者的“狼子野心”，认为作者应该判刑。但无论如何，我感到这场期盼已久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再也捂不住了。

过了一个多月，1978年7月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给我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这是当时为了避免受阻而用的一个比较含糊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论文，论文先打印200份。在请柬后面附了几句话，说在武汉大学只点名邀请了我一个人，另外给哲学系一个名额。当时中国社科院的领导已经知道当时武大领导的政治态度，也知道学校对我的压制，所以这份请柬是直接发给我个人的。当时我在政治理论教研

室当教师，经过考虑，还是在 7 月 8 日把这份请柬给教研室陈主任看了，意思是告诉他有这么回事。陈主任说这事必须请示党委，要我等着，但就是不回信。我向教研室另一位负责人提出：如果党委不同意，就请告诉我是谁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再者，参加这个会是我的权利，无论党委同意不同意我都是要去的。后来他们托一位老教师向我“转达”党委的意见：(1) 同意我去开会；(2) 要我填一张表，由党委盖章；(3) 我的论文写好后要经过党委“看一看”，党委同意后可以帮我打印。我说，中国社科院的请柬是发给我个人的，我不代表学校，没有必要填表，也无须党委盖章；我也没有论文，无须打印。但党委一直拖着不表态。社科院估计我肯定是受阻了，又特地在 10 日给我发来电报说：“请准备专题发言。哲学问题讨论会秘书组”。这封电报是发给武大党委转我的，党委也就不好再正面阻扰，算是勉强同意了。我 14 日就去了北京，同去的还有武大哲学系的朱传棨老师，他在“文革”中也是因为参加为李达同志翻案而挨整的。16 日我们到了开会的地点：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会场的条件很差，每间房里挤着住十几个人，大热天洗澡都不方便。到会的同志表情都有点神秘，相互交谈都非常谨慎。有位湖南的与会者悄悄对我说，他来的时候省委领导打了招呼，说中央对这个会的态度不明确，叫他不要发言，听听就是了。

当天晚上，哲学所的邢贲思同志找我去开了领导小组的会，参加的有哲学所的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等同志，还有《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同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这个小会把这次讨论会的来历和主题点明了，分了六个组，胡福明同志和我在一个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第二天（17 日）先开全体大会，孙耕夫同志主持，社科院副院长邓立群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下午分组讨论，空气就有点紧张了。有几位代表发言之后，忽然有位代表站起来很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会？想干什么？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说完就悻悻而去。但讨论还是继续进行，并没有受影响。以后几天都是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交叉进行，大会的会场变换了几处。大家发言的观点虽有差异，讨论的气氛还是正常的，没有剑拔弩张的争吵。这当中忽然传来了小道消息，说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还大发脾气，空气又紧张了。但会议领导小组并没有受影响，继续坚持开会。我记得中央党校的吴江、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光明日报的马沛文、南京大学的胡福明、社科院的邢贲思等同志的大会发言都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些同志也赞成实践标准，但有些保留和疑问。23 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陈述了三个问题：(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造成灾难的理论基础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2) 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确的理论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3) 回答几个诘难。

23日闭幕式，周扬、冯定、温济泽几位老同志发言后就散会了。我的大会发言受到了多数同志的肯定，同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发表时不得不把前两部分删去了。^①

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后感受到的精神解放的喜悦是很难以言语形容的，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宽阔的原野。我当时写了一首《西江月》的词来抒发这种感情：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我从北京回来后，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学校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还是暧昧的，实际上是抵制。他们要我去汇报，但对汇报的内容不表态，根本不提要我传达这次讨论会的事。1978年提副教授也仍然没有我的份，人民出版社委托我修订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们也一再阻挠^②。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是支持这次讨论的。湖北省、武汉市有好几个单位请我去作报告，我讲了好几场。那时许多干部群众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深，我讲的内容与他们在“文革”中习惯了的一套大不相同，他们好像闻所未闻。虽然鼓掌的人不少，但面露惊讶之色的也大有人在。下面递了一些条子，有热烈赞同的，也有置疑的，置疑的中心问题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话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只好耐心解释。有一次，一位主持报告会的同志在我报告结束后好意地提醒我，说如果不把毛主席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恐怕会犯错误。我只好对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身就是毛主席的话，你看看《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就知道了。他还不放心。我当场拿出书来把原话找给他看了，他才高兴地说：“原来这话真是毛主席说的，那没错，我放心了！”可见当时人们的迷醉到了什么程度，要回到正确观点有多么艰难！后来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或先或后地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陈丕显书记又以湖北省委的名义请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同志到湖北来作报告，旗帜鲜明地宣传实践标准，空气才逐渐转变了。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

^① 这两部分的内容见《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一文，载《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第140～150页。

^② 李达受毛主席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唯物辩证法部分完成于1965年冬，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阅，拟俟下卷唯物史观部分完成后出版。1966年“文革”开始，这本书被打成“黑书”，上卷送审稿和下卷未完稿被抄家时洗劫一空。1974年李达平反后，原在武大哲学系资料室工作的刘善应把他偷藏的一本送审稿秘密地送给了我。1974年人民出版社社长薛德震要我将此书修订出版。当时的武大领导说我有“问题”，不让我去修订，不同意在书中出现我的名字。人民出版社只好请我在家里修订了寄给他们。此书上卷在1978年6月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并注明了我根据李达生前的委托对原稿作了必要的修订。至于下卷唯物史观的部分书稿则始终找不到，只好付诸阙如。

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并指出这场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紧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我们这些人再也不怕扣“砍旗”的帽子了。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晚，我又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的词来表达我的心情：

一夜欢声动，袅袅上青天。嫦娥梦里惊问：“底事闹纷喧？”我笑嫦娥贪睡，一觉醒来迟了，错过好机缘。月里方一宿，世上已千年。

卿云烂，浓雾散，净尘寰。东方乍白，朝霞冉冉出天边。想见桃娇柳宠，一扫园林萧索，人面比花妍。翘首长空外，好信借风传！

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一个插曲

在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期间，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发表毛主席给李达同志三封信的事。这三封信是毛主席在五十年代李达同志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的时候写给李达同志的，“文化大革命”被工作组连同毛主席亲笔修改的《〈实践论〉解说》手稿一起从李达同志家里抄去。1967年有几位为李达翻案的干部和学生把这三封信和手稿送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1974年李达同志平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把这三封信和手稿的复印件送给了李达同志的夫人石曼华同志，她又复印了一份给我。

毛主席在 1950 年 3 月 27 日的信里提到：“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在 1952 年 9 月 17 日的信里提到：“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这就确凿地说明了毛主席本人从来不搞什么“凡是”，从来不认为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能动；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的论断也会有“不妥”和需要“修改”之处。这些信如能公开发表，对“两个凡是”将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驳斥！于是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会结束的第二天就把这三封信送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和《哲学研究》编辑部。他们非常重视，说一定要想办法发表出来。但当时要办成这件事却非常困难。毛主席的信不经过党中央批准是不可能发表的。如果报上去，不能不经过汪东兴同志和华国锋同志，他们不批准怎么办？弄不好还会说你别有用心。于是这事拖了一个多月。

中国社科院党组经过精心研究，在 10 月 12 日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报告给中国社科院党组转呈华主席、党中央，报告说：“今年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